

刊叢學獻文

古籍辨偽學

著 鄭良樹



臺灣大學書局印行

鄭良樹著

G256.3
882(2)

港台圖書

591504

古籍辨僞學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

90096669

古籍辨偽學 / 鄭良樹著 --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 75

6,307 面；21 公分

附錄：有真偽問題之古籍一覽表

新臺幣 240 元（精裝）-- 新臺幣 190 元（平裝）

1. 圖書 - 考證 I. 鄭良樹著

011.7 / 8463

古籍辨偽學 全一冊

著者：鄭良樹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

發行人：丁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二四一五六・三二一〇九七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

座 電話：三一八〇五八〇七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二四〇元
平裝新臺幣一九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初版

自序

古籍辨偽學所研究的應該是古籍的作者、成書時代及附益等三方面的課題，通過這三個方面的研究來鑑定古籍的真和偽。所謂真，是指古籍與作者或成書時代相符；所謂偽，是指其傳聞者和它確實的作者、成書時代相乖，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。一部傳聞爲「真」的古籍，經過後人的考訂，有可能被判定爲「偽」；相反的，一部被認爲「偽」的古籍，經過後人的研究，也可能恢復其「真」的身份；因此，古籍辨偽學實際上應該包含來往的兩條研究路線，不但要研究「真」書，也要考訂「偽」書，是一門「真到偽」「偽到真」雙軌同時進行的學問。

既然是雙軌同時研究的學問，那麼，「古籍辨偽學」這個名稱恐怕就不十分理想了。這樣的一個名稱，很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；只研究「真」書，並不研究相傳的「偽」書。因爲「真」書被研究並判定其爲「偽」書，所以才叫「辨偽學」；如果是「偽」書被研究並恢復其「真」的地位，那就應該叫「辨真學」呀。因此，「古籍辨偽學」這個名稱恐怕並不十分理想。

其實，在張心激出版他的《偽書通考》時，就已經按上一個不十分理想的名稱了。研究一部

古籍的作者、成書時代及附益的問題時，最終的結果可能被判爲「偽」，也可能再次被肯定爲「真」，這兩種情形都同時存在的，那麼，我們怎麼只能夠根據「真到偽」一邊的路線而按上名稱呢？清代姚際恆撰《古今僞書考》時，情形和張心激不相同，他進行的確實只是「真到偽」的單線研究而已；翻開《僞書通考》，所滙進的却包括了來往兩線的資料，那麼，因襲舊名「僞書」恐怕就不太理想了。

梁任公將他在燕京大學一系列的演講稿訂名爲「古書真僞及其年代」，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名稱，至少它不會讓人產生單軌的錯覺。如果將這門學問改稱「古籍真僞學」，也許會比較理想一些，至少它已經表達了「真到偽」「偽到真」的雙軌研究。然而，這樣的修改可能會產生下列的問題：

第一、如果「真」「偽」二字當名詞來用的話，「真」指沒有問題的古籍，「偽」則反之。然則，過去長期以來在真僞存疑之間、富有爭議性的古籍，稱它爲「偽」固然略有委屈之嫌，但是，可以改口稱「真」嗎？顯然是不可以的。因爲「偽」字可以涵蓋真僞存疑，而「真」字却不能。如此一來，「古籍真僞學」的「真」字豈不是要落空了嗎？

第二、如果「真」「偽」二字當兩個平行的動詞來用的話，那麼，就等於說是「古籍真學」及「古籍僞學」的合語了。「古籍真學」、「古籍僞學」似乎也說得通，但是，總沒有「古籍辨真學」、「古籍辨僞學」來得恰當和順口，因爲「辨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字。龐樸就寫過一篇論文叫《公孫龍子辨真》（見《文史》第四輯），至於以「辨僞」爲名的論文及專書，

就多得不勝枚舉，可見還是「辨真」「辨偽」比較習慣一些。

「古籍真偽考訂學」恐怕是對古籍真偽雙方最「大公無私」的一個名稱，而且語義既明確又清楚，但是，缺點是名字實在太囁嚅，不夠精簡。因此，與其含糊和囁嚅，還是沿襲精簡而不十分理想的舊名，然後，再加上「古籍」二字，把鑑別真偽的範圍限定在古書內。

這門學問雖然發軔於漢朝，却要到明、清才開始成熟，並且受到大用的重視。民國初年，在古史辨學派的推動下，在學術界佔着相當重要的一個席位，在某種程度上支配了古史的研究。梁任公於民國十六年完成了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》，張心澂於民國三十九年編成《偽書通考》，卷端附有總論一則；到了這個時候，這門學問才出現比較有系統的理論著作及參考工具書，讓學者們依循漸進。

雖然如此，它在學術界應有的地位似乎還沒正式被賦予。當我們研究某一問題涉及古書真偽時，頂多把梁任公及張心澂的大著拿來翻一翻，模擬其方法，翻檢有關資料；很少人檢討這些辨偽方法的可靠程度、極限，也很少人考慮到在進行辨偽時應當保持一種怎樣的態度，更很少人通過批判的方法去反省及鑑定前人的結論。此外，俯視海內外各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的課程，除私立文化大學開列有「辨偽學」外，不見各大學添設此課，那麼，它在學術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。

晚近數十年來，在古史辨學派的鼓動下，古籍辨偽學固然日益顯現其重要性，却也不能避免地受其影響而走到一條激進的路子上去。在此風氣籠罩之下，許多古籍都被打進冷宮，

成爲「千夫所指」的偽書，使我們蒙受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，也讓我們古籍蒙受許多不白之冤。邇來地下出土資料愈來愈多，更加證明前一、二代某些學者在辨偽態度及方法上的偏差，如何廓清真偽的界線，如何抱持辨偽的態度，以及如何建立新的理論等等，似乎是導引這門學問走上客觀的路子所應有的工作。惟有在客觀的、科學的及心平氣靜的研究之下，我們的古籍乃至於歷史、文化等，才能免於冤屈。

四年前秋天，良樹很榮幸地回到自己母校國立臺灣大學客串一年，在研究所裏開設了這門課，除指導學生從事辨偽的實習外，也講一些理論上的問題。良樹自愧書讀得不多，見解也很平凡，對學生沒有甚麼助益，有負母校的厚望。離校之前，將所帶去的資料編成《續偽書通考》，聊作張心澂大著的續篇，已由學生書局出版。回來後，又花一些時間，將課內所講的加以整理，分章分節，寫成這本小書；至於實習部分，則全部刪除以省篇幅。這本小書只能當作這門學問的進階而已，不敢云學術耳。發凡起例非易，增補修訂有待來日，尚祈專家學者有以教我。

良樹數十年來，承恩師王叔岷教授扶掖提携，師恩如山之重，如海之深。數年前，王師退休新、馬，回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續任研究員，山河阻隔，無法隨侍，更無緣再獲親炙。南陔荒炎，思慕再三，謹以此書爲王師七秩晉二壽，並祝王師冬夏青青，健壯如昔。

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王師壽辰，鄭良樹
序於馬來亞大學文學院第二二四研究室

古籍辨偽學

目錄

自序	I
第一章 成立及其研究範圍	一
附論：偽書產生的原因	二四
第二章 意義及其學術地位	三一
附論：辨偽的發生	五九
第三章 源流（上）	六三

第四章	源流(下)·····	八五
附論	· 唐人的辨偽學 ·····	一〇九
第五章	方法·····	一一五
第六章	方法的檢討·····	一四一
附論	· 辨偽的態度 ·····	一六〇
第七章	示例·····	一六五
第八章	新趨勢·····	一九一
第九章	專著簡介·····	二三三
附錄	有真偽問題之古籍一覽表·····	二六一

第一章 成立及其研究範圍

任何一門學問，都有它孕育和成長的過程。在孕育的階段中，它可能是另一門學問的附庸，由於理論未完成、價值未顯露，它暫時沒法獨立，形成自己的王國。歷史逐步發展，時代愈來愈進步，而學問的分科也愈來愈精細，原本蔚為大王國的一門學問，或者原本併合幾個小城邦的大學問，後來逐漸離析獨立，離開了孕育的階段，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，建立起自己的理論、方法和價值。有的學問發軔得早，很快就獨立為國；有的學問却需要相當時日的孕育，才能呱呱墜地，形成自己的天地。

古籍辨偽學無可置疑的，是屬於後者；它孕育自西漢，或許更早的先秦，然而，它却經過很長時期的懷胎，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血肉和骨骼，與其他的學問，並立於天地之間。

遠在西漢末年，劉向已經擁有辨別古籍真偽的能力和 phương 法。劉向的著作雖然絕大部分已亡佚，不過，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却被公認為保存了他重要著作《七略》的大部分本來面貌。透過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我們可以窺見當日古籍辨偽和目錄學的關係；茲引數條以明之：

《諸子略》小說家有《黃帝說》四十篇，《注》云：「迂誕依託。」

《諸子略》雜家有《大禹》三十七篇，《注》云：「傳言禹所作，其文似後世語。」

道家有《文子》九篇，《注》云：「老子弟子，與孔子並時，而稱周平王問，似依託者也。」

《兵書略》陰陽類有《封胡》五篇，《注》云：「黃帝臣，依託也。」

或云「依託」，或云「似後世語」，都莫不顯示出他辨別古籍真偽的能力。在這個時候，古籍辨偽和校讎、版本一樣，都沒有自己的園地，僅附庸孕育在目錄學這面大旗幟底下，情形就好像過去形體、聲韻及訓詁附庸孕育在文字學底下一樣。

西漢末年，雖然古籍辨偽的事件時而發生，例如《論衡·正說篇》云：

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，空造百兩之篇，獻之成帝。帝出秘書百篇以校之，皆不相應。於是，下霸於吏，吏白：「霸罪當至死。」成帝高其才而不誅，亦惜其文而不減，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。

張霸獻呈《尚書》百兩篇，被辨認為私門偽造，是當時一件大事。梁任公《古書真偽及其年代》^①又記載了兩件事，云：

當馬融、鄭玄正在融和今古文，注解三《禮》、《尚書》……的時候，鄭玄的弟子臨孝存却根本不相信《周禮》，說是「末世譎亂不經之書」，專門做了十論七難來辨別《周禮》不是真的。……另外，何休也曾經說「《周禮》是六國陰謀書」。

兩人都異口同聲地對《周禮》的真偽表示懷疑。儘管如此，這個時期的古籍辨偽，似乎還是經學或漢學的胚胎而已。

到了隋、唐，情形也似乎沒轉變。《隋書·經籍志·孝經類》及《孝經類·小序》分別說：

古文《孝經》一卷，孔安國傳，梁末亡逸，今疑非古本。又有鄭氏《注》，相傳或云鄭玄，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，故疑之。

再如顏師古，他在注解《漢書》時說：

（《孔子家語》二十七卷）非今所有《家語》②。

（《諺言》十篇）說者引《孔子家語》云：「孔穿所造。」非也③。

今有《西京雜記》者，其書淺俗出于里巷，亦不知為何人所作④。

在他們的腦海裏，古籍辨偽不過是目錄學的一條小溪流，不過是個別零碎的一門小學問而已。

劉知幾《史通》有《疑古篇》，似乎是古籍辨偽的重要著作，顧頡剛即將它編入《古籍考辨叢刊》第一集內，其備受重視，於此可見了。然而，仔細推敲研究，這個胚胎却還處在古史考辨和古經訓說的夾縫中，沒到達瓜熟蒂落的地步。試觀他在《疑古篇》所舉出的十條「疑事」，除了第四條「凡此數事，語異正經，其書近出，世人多不之信也」，偶而涉及古籍真偽之外，其他九條所討論的，都正如他在篇末所說：「今取其正經雅言，理有難曉，諸子異說，義或可憑，參而會之，以相研覈……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，非惟繁約不類，固亦向背皆殊。」古書和近史頗有歧異，所以，他依據各種異說，研覈董理，參會疏通，使學者知古書之妄及古說之虛，如此說來，他是在考辨古史和訓說古經，而不是在辨別古籍本身的真偽了。

劉氏在《疑古篇》裏一再批評一些古籍，他批評《左傳》是「左氏之爲傳也，雖義本釋經而語雜他事，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」，批評《周書》是「夫《周書》之作，本出《尚書》，甚至對一般的古籍，也作「孟子曰：『盡信書不如無書；《武成》之篇，吾取其二三簡。』推而言之，則遠古之事，其妄甚矣」的批評，不過，他所批評的只是這些古籍裏所載的古史，而不是這些古籍本身的真偽問題。

《史通》又有《申左篇》及《雜說》上下，都是討論古史真偽的文章，和古籍辨偽沒有

多大的關係。雖然《雜說》下說：

李陵集有與蘇武書，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觀其文體，不類西漢人；殆後來所為，假稱陵作也。遷史缺而不載，良有以焉。編於李集中，斯為謬矣！

討論了李陵集中《與蘇武書》的可靠性，算是辨偽學的範圍了；不過，由於單則孤篇，並非全書重點所在，所以，也就無法完成這個胚胎的哺育工作，更不要說讓它降生人間了。

柳宗元對子書及《論語》一系列的考訂文字，是最令人注意的了。他考辨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論語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亢倉子》及《鶡冠子》等，一直到現在，還是學術界所樂於徵引的對象。是他，從西漢以來第一位專門為幾部古籍寫下一系列的辨偽文字；也是他，第一位將一系列古籍辨偽的文字從目錄學、經學及注疏學獨立出來，彙為一個完整的單位。從這觀點來看，我們就瞭解柳宗元這一系列文字在古籍辨偽學史裏的地位了，更何況其中不少論點，時至今日還是相當正確。柳宗元這一系列的文字，似乎不光是為古籍辨偽而寫的，試讀下列幾則文字：

（辨《列子》）……其楊朱、力命，疑其楊子書；其言魏牟、孔穿，皆出列子後，不可

信；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，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。

（辨《文子》）……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，又頗惜之。憫其為之也勞，今刊去謬惡亂雜者，取其似是者，又頗為發其意，藏於家。

（辨《晏子春秋》）……自劉向、歆、班彪、固父子，皆錄之儒家中，甚矣數子之不詳也！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。後之錄諸子書者，宜列之墨家；非晏子為墨也，為是書者墨之道也。

這三段文字雖然只佔一小部分，不過，却也可以證明柳氏這一系列考辨文字，並不單為古籍真偽而發的。我們應當說，柳宗元在寫這一系列文字時，腦筋裏恐怕存着兩股意念：一方面要以目錄學來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，一方面要以古籍辨偽來「識古書之正偽」^⑤，而後者所佔的比重比較大些。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，古籍辨偽學到了中唐柳宗元的手裏，寢寢乎恐怕有獨立成為一門專科學問的形勢了。

一直要到明代的宋濂和胡應麟，古籍辨偽這幼嬰才呱呱誕生，古籍辨偽的名義才正式成立，為學術界所公認，而後才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專科學問。宋濂完成了一卷的《諸子辨》，開章明義即說：

先王之世，道術咸出於一軌，此其人人殊何？各奮私知而或整大道也。由或整大道也，

其書雖亡，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。然則子將奈何？辭而辨之也。曷為辨之？解惑也。

胡應麟寫了三卷的《四部正譌》，《引語》說：

唐、宋以還，贗書代作，作者日傳。大方之家，第以揮之一笑，乃銜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。至或點聖經，廁賢撰，矯前哲，溺後流，厥係非眇淺也。余不敏，大為此懼，輒取其彰明較著者，挾誣摘偽，列為一編。後之君子欲考正百家，統宗六籍，庶幾嚆矢。

這兩段文字，清楚地宣布了古籍辨偽學的獨立性格，它不再如漢、唐及宋的學者，是目錄學、經學或注疏學的附庸。誠如梁任公所說的：「明初宋濂著《諸子辨》一卷，辨別四十部子書的真偽。從前人往往在筆記文集或書目中帶說幾句辨偽的話，沒有專著一卷書來辨許多書的偽的，宋濂却和前人不同。我們可以說，專著一書以博辨群書的，宋濂是第一個。……晚明出了一位辨偽大師，叫做胡應麟，著了一部《四部正譌》。宋濂的《諸子辨》不過是文集裏的長篇文章，仍舊放在雜著之部，而且沒有博辨群書的真偽，發明通用的方法，還不算專書。專著一書去辨別一切偽書，有原理有方法的，胡應麟著《四部正譌》是第一次。他所辨的書，固然不多；他所辨別的真偽，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；但經史子集四部的書，大都曾經過他的研究

而可供後人的參考。①「尤有進者，胡應麟在《四部正譌》卷上的卷首裏，還爲文討論偽書的二十種情形，他說：

凡贗書之作，情狀至繁；約而言之，殆十數種。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罕知之者……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……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……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……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……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……有憚於自名而偽者……有恥於自名而偽者……有襲取於人而偽者……有假重於人而偽者……有惡其人，偽以禍之者……有惡其人，偽以誣之者……有本非偽，人託之而偽者……有書本偽，人補之而益偽者……又有偽而非偽者……又有非偽而實偽者……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……又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……又有本無撰人，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……又有本有撰人，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……

把偽書作偽的情形，條析爲二十種，至爲精細，且影響後世至深。此外，他又在卷下的卷末裏，爲文暢論「偽書多怪字」「覈偽書之道」「四部書之偽者」以及真偽程度的各種問題。很明顯的，胡應麟在《四部正譌》裏，已經爲我們指示出古籍辨偽的獨立性來——它有學術個性，有研究方法，也有專業理論，不再是依附在其他學科底下的一門零碎小學問。雖然他所提出的理論還不十分完整，所已知的方法還不十分嚴密，對於它的學術個性，也還沒鎚鑄